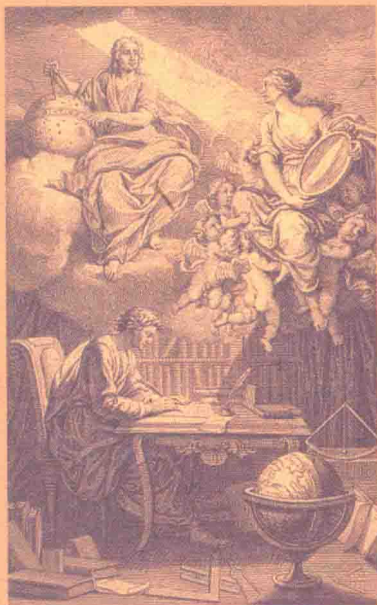


构境论： 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

张一兵访谈录

张一兵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构境论： 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

张一兵访谈录

张一兵 著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构境论：不以他人的名义言说——张一兵访谈录 / 张一兵著.
—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9

ISBN 978-7-303-20358-1

I. ①构… II. ①张…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83854 号

营销中心电话 010-58805072 58807651

北师大出版社学术著作与大众读物分社 <http://xueda.bnup.com>

GOUJINGLUN

出版发行：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bnup.com

北京市海淀区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

邮政编码：100875

印刷：北京易丰印捷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经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本：890 mm×1240 mm 1/32

印张：10.875

字数：185 千字

版次：2016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58.00 元

策划编辑：谭徐锋

责任编辑：谭徐锋

美术编辑：王齐云

装帧设计：王齐云

责任校对：陈 民

责任印制：马 洁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反盗版、侵权举报电话：010-58800697

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010-58808104

外埠邮购电话：010-58808083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

印制管理部电话：010-58805079

目 录

关于构境论的访谈/ 1

- 一、“方法论自觉”：怎样言说的话语塑形内省/ 1
- 二、以他人的名义言说是可耻的/ 22
- 三、构境、塑形与格式塔/ 43
- 四、这个时代需要哲学吗？/ 78
- 五、哲学是一种内在的精神个性/ 95
- 六、作者—文本—读者/ 127
- 七、自我与他者/ 146

附录

廓清理论地平 走向时代精神的深处/ 168

从“回到马克思”到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前沿/ 182

文本解读与哲学创造/ 204

从《回到马克思》到《回到列宁》/ 235

承认相对和有限的客观性/ 255

“回到事物本身”：马克思、列宁和海德格尔/ 270

张异宾自编学术年谱/ 303

后记/ 339

关于构境论的访谈

访谈时间：2014年1月18日(前五节)，2015年8月7日上午(后两节)

访谈地点：南京大学

访问者：张琳博士，简称“问”

受访者：张一兵教授，简称“张”

参加者：周嘉昕博士、蓝江教授、孙乐强博士(后两节)

一、“方法论自觉”：怎样言说的 话语塑形内省

问：我注意到，在您的著述中通常都有着鲜明的方

方法论自觉。对方法论的重视，是您在思维上一个自然而然的习惯，还是与您的求学与治学经历有关？

张：“方法论自觉”，是我在2004—2005年组织撰写的《马克思哲学的历史原像》中提出的，但此书2009年才在人民出版社出版。不过，2005年，我们在《学术月刊》发表了一组马克思思想史方法论的笔谈文章^①，在那里，已经明确提出中国的学术研究特别是哲学思想史研究中一个需要内省的问题是方法论自觉，即不是直接去讨论问题，而首先要自我意识到在进入学术讨论时所持有的方法论是什么，并判断你所批评或者赞成的研讨对象的方法是什么，这是有可能正面、实质性地进入讨论的关键性前提。现在我们学术界发生的很多所谓学术讨论，经常出现的情形是论辩双方根本不在一个讨论域或者思考层面上，奇怪的是，双方还会相互以为在讨论同一个对象。真相是，批评者和回应者都没有内省自己的方法论，即怎样言说的话语方式。在海德格尔的哲学方法论思考中，他在现象学的基础上提出从现成对象的“什么”(Was)转向功能性的“怎样”(Wie)，思考的正是这一问题的实质。在我看来，进入任何一个学科的讨论，最重要的问题首先都是一个方法论自觉的问题。我

^① 张一兵：《如何真实地呈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生史》，载《学术月刊》2005年第10期。

在什么立场上，以什么样的标准、以什么样的话语塑形方式进入一个领域，这是我们发生真正的学术对话、争论，进而推进一个理论深化的最重要的合法性明证。

关于方法论自觉问题，并不完全是我个人的创造。在我们自己求学的过程中，老师辈就已经这样跟我们研讨这些问题：所有的哲学思想资源在我们这里都不仅仅是知识，而是一种让我们能够去思的存在方式。应该说，对方法论自觉的强调，可能也是我们这个学科传统其中的一个要素。在孙伯鍈先生那里，哲学是一个方法，而不是一个知识积累，这种想法很早就有了。这也在于他对马克思哲学本身的一个理解。我和孙伯鍈教授在20世纪90年代与黄楠森先生有过一次重要学术争论：马克思主义哲学到底是一种体系哲学，还是一种方法论？^①按照孙老师的理解，马克思的哲学革命意义之一，就是使传统哲学的提问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马克思是把知识性的概念体系、逻辑体系（海德格尔则指认为全部西方形而上学）转化为一种活的方法论。孙先生在整个哲学学科基础研究中，把哲学思考本身跟方法的思考结合在一块，所以，这个问题并不是我的发明，而是在我们这个学科点上由孙先生等学术前辈很早提出

^① 孙伯鍈等：《体系哲学还是革命的科学的方法论》，载《天津社会科学》1997年第6期。

来的，只是我将它系统化和公开表达出来了。所以，方法论自觉不是我们天生的一种习惯，而是在前辈的引导下，我们这个学科治学的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我们进入马克思哲学，进入中国的传统哲学，进入西方学术的研究，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一个前提性问题，就是对方法论的关注。（这个问题在中国的学术界并没有真正得到认真的思考，所以，丰子义教授在2013年北京大学马克思论坛上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的“方法论自觉”问题，至少是一个重要的认可。对此我是很受鼓舞的。）

顺便说一句，“方法论帝国主义”是阿多诺、海德格尔在后来共同否定和批评的对象，这是现象学“败北”以后西方后学对方法论决定论很重要的一个批评。在我已经自知的认知处境上，往后谈，我会谈到自己遭遇的一个悖论：就是在我们中国目前的学术进程中，往往我们国内还没有进入的那个学术思考阶段，在西方当代大师那里已经成为批评的对象了。然而，我们又过早地遭遇到西方当代大师的思考，这使我们中国学术界在与世界学术界的整个共时性的关系中出现了一种奇怪的颠倒和逆反。对此，我可以打一个不一定确切的比喻，比如说，今天整个中国现实的土地上，出现了一种历史时间的空间性布展。在欧洲的原发性社会历史发展中，不少民族都真的经历了马克思所讲的那样几个阶段，原始共

同体、奴隶制度、封建制度、资本主义现代社会和后工业社会，似乎是递进式地线性走过来的。并且，在一些欧洲国家的社会进程中，除去像东、西德这种特殊情况，大多数历史进程中一个国家的不同地区基本上是同质性的。而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则是从东部到西部的梯度进展结构，在今天中国的土地上，若从香港入境，一直到川藏，也像是后现代、现代和前现代的发展阶段之间的异质断裂，历史线索在空间中布展。但有趣的是，我们又在信息化全球化的过程中，在所有不同质性的社会空间里，同时遭遇到后现代文化。我一直觉得，后现代在中国被接受，实际上完全是一个断裂和逆反的过程，因为如果没有现代性对前现代的否定性遭遇，后现代是不可能真正被理解的。所以，前面讲的方法论的问题也是如此，方法论自觉是我特别希望中国学术界能够进入的一种状况，但对方法论本身的关注，在海德格尔和阿多诺那里已经遭到了一种很深刻的批判和拒绝，这是一个复杂的悖论。

在15年前出版《回到马克思》^①的时候，我提出了解读模式的问题，这个问题实际上是进入这本书的一个前提条件。解读模式问题是我对方法论自觉的一个很重要

^①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9月第一版，2003年4月第二次印刷，2005年第三次印刷；2009年8月第二版；2014年1月第三版。

的具体践行。它不是一个口号或理论花招，而是与传统马克思研究方法的一个隐性争执。这个争执是什么？过去理解马克思，只有一种真理性的理解，就是斯大林式的官方意识形态的解读，准确地说，是前苏联东欧教条主义的解读模式，这就是对真理的一种线性的解读、独白式的解读。传统教科书传给我们的东西都是不能质疑的真理，不按照教科书去理解的，就是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想。我在《回到马克思》中开始试图引出的问题，就是对独断式方法论的历史性解构。在我看来，解读模式实际上就是明证一种解读方法的相对性，不同的解读方法必然会产生对同一文本的异质性理解，显然，这里我想动摇的是过去意识形态居统治地位的前苏联东欧的解读模式，那个解读模式同质于真理，同质于唯一性的绝对正确，人们即便在对文本的具体诠释中存在差异性，但实际上整体的意识形态线索是完全一致的。所以，我在那里进入问题讨论域的时候，提出的第一个关键性问题就是方法论自觉，实际上，也是指认了在对马克思文本的理解中存在着解读模式的多样性或多种可能性。当然，我自己并不是一个多元化主义者。在这里，我既拒绝了前苏联东欧的解读模式，也没有跟着西方马克思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走，而是希望真正走出当代中国学者自己的一条道路，我称之为“中国人自己面对文本的过程”。这是在当时《回到马克思》写完的时

候，对方法论做的一个最重要的说明。后来，我又把这样一种方式平移到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当代西方哲学的研究中。

你会发现，我在进入研究过程的时候，首先是拒斥那种在学术界占统治地位的被认同了的似有自明性的解读模型，我基本上都会从一个非常奇怪的，或者是他性角度去进入，造成和传统解读完全不一样的一种另类解读。这也与方法论的自觉有关，或者说是对独断论方法论的一个有意识的破坏和解构。

问：您提到“中国人自己面对文本的过程”，《回到马克思》中提出的文本学研究方法与此有关吗？

张：文本学也不是我的发明。回顾我们学科上个世纪70年代以后的发展过程，你很容易就会发现，最早孙先生带着我们在哲学专业学习的时候，我们这个学科基础在方法论上有几个重要的方面：首先你会看到，我们非常关注文献。应该说，这并非我们今天的发明，其实在过去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中，所有学者都是非常重视典籍和文献的，恰恰是现在我们在自己的研究里面丢了这一块，现在做“文本学”好像倒变成我的一个发明了。其实根本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中国几千年来的汉文化存在或者延续的方式，按照我们今天的话来说，基本上是一个文本学诠释和伸展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春秋战国时期大批原创性的东西出现以后，几

千年来中国学术的传承，都采取了一个学者与文本的诠释学的关系，或者叫诠释存在论的关系。所有人开始都是从文本开始，与经典伴随终身，在古人那里，很少出现我们今天这种离开经典文本依据的宏大叙事。这个文本诵读的过程甚至从童年就开始了，从并不完全知道内涵的经典诵读、熟读开始，背唐诗，背典籍，刚背的时候，是类似黑格尔所讲的根本不知道文本内涵的“绝对抽象”。从背典籍和背文本起始，从抽象的不知再到生存中不断发生的具体的知，这是一个生命化实践的过程。我们发现，中国传统学术传承绝大部分都是一代又一代人和典籍之间的一种存在论关系，形象的说法就是“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关系。

孙先生让我们重新看到的最重要的问题，其实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重要学术传承方式和学术研究方式，用很时髦的话就是“文本的田野耕作”。这也是我《文本的深度耕犁》^①一书所标识的方法论意义。但是，我们很多年来自己丢掉了这个传统，文本学并不是西方来的哲学解释学的方式，而首先是我们民族传统学术研究的根基。跟随孙先生的学习，很好地体现了这一传统。他带博士，就是前三个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

^① 张一兵：《文本的深度耕犁——西方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解读》，第一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二卷，2008年版。

卷到第六卷，你先去读，最后再一点点讨论。他根本不会让我们一上来就去看二手文献。所以，在我们刚开始学习和讨论的主要过程中，从来没有遭遇过二手文献，“某某说马克思是什么”、“某某论黑格尔”不会占据我们的思考空间，我们必须学会依据经典文本而来的“马克思说什么”，“黑格尔是什么”，“亚当·斯密是什么”，这是第一方面。

此外，除了传统文化中的经典文献诠释学是我们最重要的基础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孙先生历史学方法论的基础。孙伯鏊先生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的，他面对学问的过程是考据学的方式，历史实证的方式。也由此，孙先生才会成为中国现代马哲史的重要创始人之一。北京还有很多重要的学者，像陈先达先生、庄福龄先生等很多前辈，孙先生是其中之一。孙先生的历史学方法也是特别深地影响了我们这个学科。重原始文献，重考据，重历史定位，这可能是我们学科后来在研读方式上的重要基础，也是我的所谓文本学研究方法的前提。

问：在您的教学中，是如何强化方法论方面的指导的？效果如何？会不会碰到类似“默会知识”所带来的传播上的局限？

张：我挺惊讶，你这里会提到波兰尼(Michael Polanyi, 1891—1976)所说的默会、意会，或者说缄默的

知识。这也是我很多年以前特别关注的一个重要学说。^①我当时有个定位，波兰尼的意会知识是和中国的体知文化非常接近的。其实，我一直都想写一本关于波兰尼的书，苦于没有时间，但这件事情总还是要做的。以后吧。我觉得，波兰尼就是用西方理性的结构非常明晰化地把东方式的体知文化内部的那种不可言传的话语塑形和突现场境性展现了出来。你这里的追问特别好的地方，是一下子就抓到一个更深的问题，并且它跟我们前面已经展开的那个问题方向是一致的。

特别有趣的一个真相是，孙伯鍈教授虽然传给了我们关于方法论的思考路径，但他在实际教学当中，从不明确地从知识层面上告诉我们什么是方法。所以在这个意义上，他倒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国传统的思想家。对此，我可以举个例子，在孙老师的教学过程里，比如他讲《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只是从第一页开始，非常细地往后面解读，但从来不会在课堂上说你们用什么方法来解读，你们思考时用什么样的思路是重要的。孙老师的解读从来没有直接的逻辑概括，从来没有方法论的明示。可是，孙老师的课从来都非常吸引学生。在南京大学哲学系的老师中，孙老师是非常受爱戴的，当时的

^① 参见张一兵：《波兰尼与‘个人知识’》，载《哲学动态》1990年第4期；《缄默认知：波兰尼意会认知理论的探索》，载《江海学刊》1991年第4期。

哲学系 77、78 级本科生和我们第一届(78、79 级)研究生对他都是十分崇拜的,甚至中文系、历史系的同学也常常来蹭他的课。但是,听他的课,学生中会截然分成两种人:一种是传统教学模式出来的孩子,他们的状态是基本上听不到东西。因为孙老师上课没有任何直接的逻辑要点,比如像教学大纲中的那种大一、小一的教案式要点从不出现在他的讲课中。他的讲课,实际上是一个逻辑话语的推演过程,这是黑格尔《逻辑学》中概念深化和辩证置换的典型思路。在讲授过程中,孙老师不断地提出一个个递进的问题,但从来不给现成的答案,这些问题本身一层一层地剥离,到了最后结束的时候仍然没有结论。所以,你只能在里面体会他面对文本的实际的逻辑的运用,一个话语的实时的建构性运用,如果按照我最近在做的福柯的话来讲,就是在认知考古学里探究话语的塑形问题。这对于传统教科书训练出来的孩子来说,他们在孙老师的课堂上几乎什么都得不到。第二种人,能够获得东西的都是聪明的学生,他们能从孙老师的讲授中去学老师是怎样分析问题,老师是如何遭遇文本,如何言说的。当然,这也是后来我自己的概括。方法论自觉的问题,孙老师从来没讲过,从来没有明示过。像我们中国传统佛学中的师傅带徒弟一样,小和尚要在非明言的挑水、扫地中去悟道,这是一个体知式的意会过程。可是,在我自己面对学生时,我已经把孙老

师的体知教学法破坏了，因为我将方法论问题明晰化和言传化了。所以，我在课堂里讲方法比较多，然后，会公开去讲口号性的“方法论自觉”，还会细化地把东方式的体知文化，其内部的建构和突现性场境意味，统统直接展现出来。这是我在教学过程中跟孙先生的很大差别，并不是说，孙老师直接提出了方法论自觉，而是孙先生的话语方式实际上就是在强调方法，强调一种立场，强调一种话语的运作。我们学到的是这个话语塑形和思想构境的方式，而不是学他的结论，或者他的要点和观念性的概括。哲学为什么不是知识，而是一种海德格尔所讲的“思”的“怎样”，这是需要我们沉思的。

问：那您跟孙先生授课方式不一样，您会很明示方法论的一些具体的判断和主张，那您觉得效果怎么样？

张：我自己觉得，效果会比孙先生的要好一些。但实际上，还有一个方面的客观原因，我与孙老师面对的教学对象已经发生了变化，我的教学方式也是今天教学过程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为什么呢？我也讲一个让自己蛮难受的事情。在上世纪70年代末我们读书的时候，文科的最高分都是在文史哲专业（现在最高分都在商学、管理学和法学等学科），那时学生的主动性特别强，教与学是一个互动的积极研讨的过程。而我在1993年回到南京大学，上的一些专业博士生的课程，却变成了从头讲到尾，当我说，大家提问题吧，学生们都低着头，